

从户口册与家谱的比较看清代 辽东移民的身体素质^{*}

定宜庄

【提要】 本文根据藏于辽宁省档案馆的盛京内务府户口册所载入人丁的生育、死亡和残疾情况,并结合有关家谱等文字记载以及在当地农村所做的调查,讨论清代辽东移民人口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高病残率等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与当时自然环境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作者】 定宜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对于清代东北社会的研究,虽然曾出现过几次高潮,但现在却趋于冷落,至少在国内史学界是如此。在史料上没有更多突破,当是原因之一。由美国学者李中清等人开始的对盛京内务府人丁户口册的利用以及由此得出的一批研究成果,使我们重新燃起对东北历史与社会研究的兴趣。据佟永功先生在《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解析》一文中的介绍,这批册子共有3 625余件,除小部分破损外,大多完好无损^①,登记了清代乾隆中期以后150年间由该机构所辖各种人口情况,而在这些人口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三佐领直属人丁^②,他们主要由清初从山东等地迁来辽东的汉族移民组成,在旗内具有正身旗人的身份,并由此构成了与未曾入旗的汉族移民以及身份较低下的官庄壮丁的区别,而自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虽然登录在这批户口册中的只是盛京内务府三佐领下旗人,但他们与当地外八旗旗人既然同居一处而且互相通婚,人口行为有很多是相同的;而作为辽东移民中的重要部分,研究旗人的人口行为,对了解其他移民也具有参考价值。在本文中,我们只讨论其中的一个方面,即通过户口册反映出来的这个人群的身体素质,这在以往史学研究中基本上还是一个盲点。

一、高生育率与高死亡率

(一) 户口册中的个案反映的生育与死亡

盛京内三旗户口册记录了大量有关人口出生、死亡的数据,而尤以出生的记录为最详,在所有入册男女的名下,都可看到某某人的生肖和准确到年月日直至时辰的记载,但用它来讨论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却存在着许多困难,主要是户口册对孩子出生一项的登记相当随意,大抵是凡有职位者、族长以及甲兵,或者每户的长子,对其所生子女的记录就较早较详,对其他人往往就草草了事。在时间上,前期较为严谨,后期就相对草率。各种册子的质量也根据距城的远近与旗分的高低而有

^{*} 本文中的许多内容都曾与郭松义教授和李中清教授讨论过,本文写作还得到郭松义教授在各方面的具体帮助,也从李中清教授的研究中得到许多启发,特此致谢。

^① 载《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67~70页。又据该档案馆告知,另有残本2 000余册未计算在内。

^② 在我们掌握的册籍中,三佐领直属的人丁册是数量最多的,据粗略统计,保存完整的共有42种,862册。佐领是清代八旗组织的基层单位,这里所说的三佐领,系指属于盛京内务府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下的佐领。

好坏之分,甚至同一册子也会因记录人员的水平与负责与否而有很大差异。

这种随意性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以户口册为据来统计这个人群的总和已婚生育率之毫无意义。单凭户口册,我们既无从知道一对夫妻婚后一共生育了多少个子女,也无从知道婴儿出生后有多少人能够活到周岁,而且由于这种记录并无规律可循,我们甚至也难以判断从周岁到成丁期间入册男孩究竟在全部男孩中占据了多大比例。更何况,这还只是就注册于册的男子而言,还有大量人口包括男子根本就从未被注册在册子之中。而对生育率统计的困难,又直接影响到对诸如生育头胎、末胎的年龄及生育间隔和儿童存活率等情况的分析统计,在这点上,盛京内三佐领户口册与清代皇族的《玉牒》^①是不可比拟的。

虽然无法做总和已婚生育率统计,但利用户口册来观察一些个案,并进行一些描述性的说明,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个案在户口册中比比皆是,但在其他文献中却很难见到。我们拟以盖州满汉人丁户口册中的郑氏家族为例来讨论这一问题。

郑氏居住于盖平县(今辽宁省盖州市)的灰庄屯与龙湾两处,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族。盖州满汉册最早为乾隆十八年(1753年)本,其中仅记郑家两户,一户为居住于灰庄屯的郑起学、郑起达及其堂兄等四个家庭,另一户为居住于龙湾的郑起哲。由于从乾隆十八至三十九年(1774年)之间的册子散佚,这里只能从乾隆三十九年册算起。

郑氏从起字的下一辈即单字辈以下,大致可见两类情况。第一类是单传,如郑起学长子郑维生一子,即郑羲洪,羲洪逃走后仅留一子即福达,福达又仅生一子为杨春,杨春至50岁仍未娶妻,此支即绝。其弟郑起达长子郑先也仅生一子郑羲瀛,羲瀛生福山,福山生孟春,五代单传,等等。第二类虽然生育很多,但其中早夭者也不少。以羲字辈为例,郑纯七子中,第二、三两子逃走,四子20岁死,此三人应算成年,第五、六两子早夭,结果仅余长子羲洪一人。再如郑起信仅生一子郑侃,侃生三子,前两子分别于6岁、4岁时早夭,仅余幼子羲漪一人。龙湾郑起哲一支单传情况不像灰庄屯一支那么明显,但多生多夭的情况更多。如郑俭长子郑羲洛生三男三女共6人,有一男一女早夭;郑俭幼子郑羲洪之子福顺生三子,前两个分别于13岁和9岁时死去,等等。

第二类情况的存在提醒我们,所谓的几代单传,很可能是因户口册的漏记,这有几种情况,一是只记已成年者,这样就看不到未成年即早夭的记录了;二是有意的漏报,如生三子只将一子呈报入册。郑起哲一支因读书为宦者多,册籍对该族记录远较其他家户更详,单传的情况也因此而较少,就是一个证明。但无论如何,儿童中夭亡者多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二) 从盖州调查所见的生育与死亡情况

关于妇女的生育与儿童成活率等情况,是我们在盖州调查时较为注重的内容,凡与妇女谈话,都详细询问有关生育、节育、流产及哺养等问题。以这样的调查来填补户口册留下的空白,是存在明显局限的。首先,被访妇女的年龄当时(1998~1999年)都在76~94岁之间,即出生于20世纪的头20年左右,其生育期基本上在1930~1950年,正是从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一段特殊和动荡时期,有些情况未必具有典型意义,至于她们对自己母亲一代生育情况的回忆,则大多是模糊和简略的。其次,这些妇女的祖先在清代有随旗人,也有民人,也有的说不清准确身份,难以进行分类比较。再次,对妇女进行访谈,尤其是涉个人生活时,要远比一般访谈更加困难,何况这些80岁以上的妇女绝大多数都不识字,无法进行问卷调查,只能依靠个别访问,遂使我们得

^① 《玉牒》即清朝皇室的家谱。清朝对于皇族出生人口的登记呈报制度非常严格,规定宗室所生子女至周岁时向宗人府呈报,载入黄册;觉罗所生子女于三日内由首领亲加查询,于每年正月初十日前送宗人府编入红册。且严禁将抚养异姓之子呈报。虽然周岁之前的生育情况仍然难以统计,而且在乾隆朝以后错漏亦日渐增多,但毕竟比盛京内务府户口册的记载要准确得多。参见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载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0~171页。

到的案例在数量上受到极大限制。更何况我们的调查仅仅囿于盖州一地,未必能代表辽东的普遍情形。但尽管如此,将这些调查结果与户口册记录的情况相参照,还是能多少窥知当时情况的。

1998年我们曾在下洼村访问了1930年以前出生的31户老人,其中妇女能够说清自己生育情况且生育数量在5胎以上的一共有14户,还有5户因女主人不在,家中男子分别声称自己有过5、5、6、8、8个子女,具体情况却记不准确,这几例都未放入表1中。即使如此,该村中生育多胎者至少也应占全部家庭的2/3左右,这一个案对我们了解当时盖州等地妇女生育情况应该是有意义的(见表1)。

表1 下洼村李姓1930年以前出生妇女生育情况

序号	年 龄								总生育数		总存活数	
	结婚	生头胎	生二胎	生三胎	生四胎	生五胎	生六胎	生七到末胎	男	女	男	女
1	22	25	27	28	34	37	39	—				
2	21	23天	24天	25	27	29	34	36、39、42	2	7	1	6
3	23	24	—	—	32	—	—	—、43	4	4	4	4
4	21	22	一天	一天	27	29	31	33、39	4	4	4	2
5	17	20	26	29	31	34	—	—	3	4	5*	4
6	—	20	22	24	26	30	32	—	2	4	1	4
7	23	24	26	28	35	38	39	41	4	3	4	3
8	17	一天	22	25	27	31	36	38	2	5	2	4
9	21	22	26	一天	一天	29	32	37、42、43	3	6	2	5
10	17	18	22	一天	29	35	—	—	4	1	4	0**
11	20	21	25	一天	33	35	39	—	3	3	2	3
12	21	22	24	31	40天	43	—	—	3	2	2	2
13	19	22	天	31	天***	33	35	38、41	2	6	1	7
14	17	18天	21	24	天	28	天	33、39、43	5	5	4	3

* 自述有两个男孩,一个3岁死,一个2岁死,但记不得是第几胎了;** 自述女儿在8岁时被鸡咬,得破伤风而死;*** 自述有两个孩子,一个死于疹子,一个死于痢疾。

注:凡在数字后写天的,数字表示该妇女生育时年龄,如“18天”即生育时该妇女为18岁,孩子未成年即夭亡,“一天”表示该妇女已记不清自己生育时年龄。

虽然她们对自己夭折孩子的记忆多半是模糊的,但一个村中多数妇女生育5胎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0胎。可见这里直至20世纪中叶,其人口行为仍属“自然”的生理行为。从以下所录该村老人的自述可知,“随便生”是他们对生育行为的普遍形容。即使有不生育的愿望,也不知道任何人为的避孕手段,堕胎则被认为不人道。

受访者一:“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生一个就得抚养。不想要可是没办法。反正没生的时候就一点办法也没有,有办法就不人道了,那不行。说实在的真愁。生下来以后死了倒行。”

受访者二:“想不要孩子,可是没有法儿。”

受访者三:“那时候随便生,我没流产过。过去不想养了没听说过有什么办法。”

受访者四:“那时候生多少不限。家家孩子都多。”

受访者一是下洼村如今辈份最大(德字辈)的老人李德清,是最有代表性的。孩子没出生时毫无办法,但婴儿出生后无论何种原因死亡则被看做是很正常的事,不会受到任何谴责。

“过去老人不是有这个话么:生一千,死八百。”“那时候小孩死了,拿布包一包,捆上了,就扔到树林子里,树林子里净是死孩子。过去坟圈子那儿死孩子有的是,席筒子一包。”

这些话不无夸张的成分在内,但毕竟也道出了一些现象,且这项调查所记孩子的生育间隔、妇女生末胎的年龄以及孩子夭折比例,都与户口册所记郑氏家族的情况大致相仿。

(三) 婴儿死亡原因

婴儿死亡的原因,首先是“脐带风”,也称“产后风”,是因旧法接生不卫生导致的破伤风。城关镇

章郎寨村一名郭姓中医的形容是：“过去剪脐带不用刀，就把秫秸劈两半，也不把脐带绑住，就那么一拉。感染了，到第七天肯定抽风，抽风就肯定死，但大人没事，因为胎盘跟着出来了。”当地有“五天风六天冷”，或“七天风八天横”的说法。我们推断，这应该是婴儿死亡的首要原因。

婴儿死亡的另一原因是疾病。在盖州，妇女们谈到其孩子的死因时，提到最多的就是“跑肚”，估计是因食物和饮水不卫生引起的痢疾、肠炎等症。当然，儿童患病率高，与喂养不经心有直接关系，太阳升乡邵屯一金姓妇女（81岁，其夫家为随旗人）说：“那时不把孩子当回事，就当狗崽子一样。老妈也不管，不给看。她有好几个儿子，一家一群孩子，她嫌累，再说她也得下地做活。孩子没人管，就在地爬。我父亲生了哥儿三个、我、还有一个妹妹；我二叔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三叔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有死的，我二叔家死两个，我三叔家死一个，我们家死一个。”

类似的议论不少，这是较典型的一例。当地妇女承担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都相当繁重，孩子缺乏照料是普遍现象。再加上当时人们的预期寿命较短，壮年丧偶的比例很高，很多人未及成年就失去父母的呵护，这不仅导致大量幼儿因病致死，未死的也有不少成为残疾。我们在正黄旗肥地一面城汉军人丁户口册中也见到过类似的例子，如潘氏家族中的潘贵智死去且其妻改嫁之后，他留下的三个孤儿中，两个年幼的就有一个眼瞎，一个“通肠”。社会和家庭对于儿童的抚养普遍持漠视态度，且儿童保健知识的缺乏，应是儿童死亡率和病残率高的主要原因。

还要指出的是，虽然婴儿死亡率很高，但绝非故意的弃婴，我们访问的所有人都绝口否认这里有弃婴行为的发生，尤其不承认有弃女婴的行为：“生下什么是什么，没听说溺婴，养活不起也不能扔，给人喂。”“哪儿能把丫头扔了？养10个也不能扔。咱家是老实人，这种事咱没见过。”

户口册对女儿的记录虽略，但从郑家的情况看，女孩的夭亡率未必高于男孩。如郑羲溥后代铨恕有两子三女，其中一子早夭，三女却都存活；羲汶之孙同春有一子三女，羲源一支的锡昌有二男八女，仅一女早夭；其叔恩浩有三男三女，一女早夭；羲浚一支的站春有一男四女，荣春有三男三女，其中一男一女早夭。民国初年，政府曾命各省派专人调查溺婴情况并成立育婴堂，但在北方各省包括辽宁省呈交报告中，都否认当地有溺婴现象存在。我们多年查阅档案史料及实地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些报告并非妄言。从表2中亦可见，各家中男女孩子的死亡率是大体相等的。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多、习俗之杂，将南方人口密集地区常见的溺婴习俗当做惯例并不是客观的态度。

由此可见，无论是这里的高生育率还是伴随而来的婴儿高死亡率，都不是人们自觉干预和控制的结果。在辽东这样的新移民地区，土地与人口间的矛盾并未达到尖锐的程度。清朝前期这里缺乏的是劳动人手，后来差赋折银，人丁的增加也不会导致赋税的加重。尤其是其中的随旗人，他们在承担清廷赋税的同时，也多少受到朝廷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优待与保护，虽然这种优待不能与八旗“满洲”同日而语，但从总体上看生活还是较有保障的。再者，他们的主体系由山东等地“一担挑”的贫苦农民构成，受文化水平所限，也不像江南社会中具有避孕、堕胎的知识^①。人口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问题尚提不到日程上来，这是清代辽东移民地区与江浙一带的不同之处。而对这一事实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在这150年间辽东人口的急剧增长，这仅从户口册本身的记录也可明显看出。

二、从户口册所见的病残者比例

在盛京内三佐领人丁册中，详记有甲丁、壮丁、老丁、废丁等不同名目，这当然是为了官府征纳赋役的需要而造送的。我们目前还不能明确解释“废丁”的含义，如果按照一般理解，认为废丁就是因病残而不能应差的壮丁，则户口册中某些年份废丁的比例竟占到总壮丁数的1/3甚至更多，比例

^① 参见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载李中清等编：《家庭婚姻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之高颇为出乎意料。这里需讨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废丁的人数有几分可靠性;二是如果废丁人数基本属实,那么从中体现出的这个人群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体状态。

(一) 病残者与废丁浅析

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之前,各人丁册大多记载诸丁中有病残者的具体状况,只是在每户后计算诸丁人数时,将有病残者包含在“废丁”称谓之内(因为也有只称废丁,不注明病残名目的)。乾隆四十八年以后的册子则明确注有“废丁”一栏,对他们的具体残疾情况却多数不再记录。这里先谈乾隆年间册中有关病残的记录情况,如据乾隆三十九年的正黄旗郭三屯户口册所记,病残者71名,其中:腿瘸4,眼坏1,眼瞎13,聋2,膀坏4,胳膊坏1,腰坏5,残疾1,罗锅1,身矮小1,傻6,疯傻1,羊羔疯(癫痫)2,手痒6,腿瘫1,半身不遂1,吐血9,癆症12。

除了郭三屯册的这些名目之外,出现在户口册上的病残种类还有疮、哑、吼癆(哮喘)、阴症、通肠(可能是慢性肠胃炎)、点脚(跛脚)、脖痒、迷疾、双眼昏花、下巴漏等,也有只写残或废的。这些情况还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残,一类为病。残疾类即身体或智力残障,如眼瞎、眼坏、罗锅、腿瘸等,又有先天的和后来因病或意外事故而致残之分,疯傻、痴呆等智力残疾也归入这一类。还有一类是疾病,其中如吐血,可能是癆病即肺结核所致,至于户口册中经常可见的手痒等,我们猜测这是一种皮肤病,也归在疾病一类。这些对病残种类和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记录,对于研究当时的流行病、遗传病等也许会有价值。

一般地说,凡为征缴赋税之用的各种官方册籍,所录人丁情况总会存在假冒和隐漏,户口册也不例外,如果仔细推敲,册中也确实存在诸多疑点。诸如在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的册子中,病残丁的比例突增;再如乾隆四十八年以后,各户口册逐渐不再记录人丁的具体病残情况,而一概记为“废丁”,这样到嘉庆六年(1801)前后,有些册子中废丁的人数之多已令人难以置信。其一,郭三屯户口册。选取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四十八年和嘉庆九年(1804)三个册子进行比较(见表2),结果发现,在嘉庆六年册的124名废丁中,仅有6名被具体注明了病残种类,只占全部废丁的极少数;此外在该册的全部90名壮丁之内,也有8名被注有病残。所以该年度的册子中,废丁与壮丁之比为124:90,如果将壮丁中的病残者也算入废丁类,则为132:82^①。其二,肥地一面城户口册。选取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嘉庆六年三个册子进行比较(见表3)发现,1801年度的册子中

表2 郭三屯户口册中不同年份的病残与废丁人数比较

年份	总丁数	残疾人数	在全部成年男子中所占比例%	疾病人数	在全部成年男子中所占比例%	二者合计	在全部成年男子中所占比例%
1774	225	41	18.22	28	12.44	69	30.66
1783	276	66*	23.91	46	16.66	112	40.57
1804	328	废丁124,占总数的37.8%,其余病残丁8,共计132,占40.24%					

* 在这66人中,有12人被注为“废”,这是乾隆三十九年册中没有的。因很难判断其确切含义,暂且列入残疾栏中。

表3 肥地一面城户口册中不同年份的病残与废丁人数比较

年份	总丁数	残疾人数	在全部成年男子中所占比例%	疾病人数	在全部成年男子中所占比例%	二者合计	在全部成年男子中所占比例%
1749	595	31	5.21	49	8.23	80	13.44
1780	583	86*	14.74	75	12.86	161	27.61
1801	726	废丁272,占总数的37.46%,其余病残丁29,共计301,占41.46%					

* 其中注为“废”者16人。

① 该册中还有甲丁16名,有职位者10名和新增丁12名,应该都是健康人,在本文中并未计入90名壮丁之内。另外,在未成丁的男子中,还有12人被注明为病残者。

有壮丁 280 人,废丁与壮丁之比为 272 : 280,如果将壮丁中的病残者也算入废丁类,则为 301 : 251。

据有关报道,目前中国残障者约有 6 000 万,约占总人口的 5%,这与世界人口中残障者的比例大体相仿。如按这个标准看,较早的乾隆十四年肥地一面城册中的记录与此是基本相符的,可知这些册子所记情况不致过于离谱。但在较后的几个年份中,如果不算疾病而仅算残疾人数,就已高达总人数的 20% 左右。尤其在郭三屯册中,从 1774~1783 年,残疾丁高出 10%,在肥地一面城册中,从 1749~1780 年,残疾者竟高出一半,无论从所占人丁比例上,还是从增加的速度上,都未免太快了。

废丁人数在嘉庆六年(1801)前后达到高峰,此后逐年下降,到咸丰八年(1858)左右在很多册子中都已接近于零,对此最合乎情理的解釋,就是当官府将所纳差赋改为征银之后,对废丁的统计已无多少实际意义。

(二) 潘氏家族的病残者与废丁

户口呈报制度总是存在一定误差,加上我们对废丁的概念也无法做出圆满解释,所以仍然采取追踪几个个案的方式来具体考察这一人群的病残情况。从上面列举的几表可知,较早一些册子如上述乾隆十四年肥地一面城册等是有一定可信度的,是这几个个案的主要依据。

载在肥地一面城册的潘氏,居住于开原市靠山屯镇。该家族留存至今的文本,包括保存于靠山屯镇潘明生家的伪康德五年所修潘氏《血统金鉴》(下面简称为潘氏族谱)正本与手抄本各一部、潘氏谱单一份、甘河子村潘家老坟地的碑文一通(光绪十二年即 1886 年立)。将户口册所记情况与该家族自撰的族谱进行对比,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信息。

首先,从户口册的统计看,该家族病残者的比例之高颇引人注目,今从册中提取可以与《潘氏族谱》相对照的潘国泰一支胪列于下(见表 4)。

由于册子对潘氏这一支的病残情况记载都较具体,很少有笼统称为“废”或“废丁”的,所以有一定参考价值。表 4 中第四世国字辈、第五世世字辈中极少残疾逃亡情况,系因户口册缺载所致^①。对残疾者记载最详的是第六、七两世。从表 4 中可见,在潘氏国泰支的六世共 7 人,3 人有残疾,2 人报逃,2 人无嗣。无嗣的 2 人都因未娶。七世共 6 人,3 人残疾,2 人报逃(其中一人是残疾兼报逃),在余下的两名没有毛病的人中,还有一名的儿子又是废丁。

前面提到,在各种册子中嘉庆六年前后的病残者都突然增多,潘氏第六、七两代正逢此时,所以也不例外。这固然不排除有为了逃避差赋而故意隐瞒和造假的因素。然而造假究竟有多少意义,正是这里拟讨论的问题。

内务府三旗壮丁一向以交纳贡物而非出征服役为主,且残疾者是否可以免赋,残疾到什么程度才可免,又免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从未见文献上有过任何规定。即从表 4 中所列潘凤之子潘文昭既为废丁又为百总的情况看,既然能充任百总,未必就能免赋,如果这样,假冒废丁就未必有多少意义。如果残疾者确实能够减免差役,那么废丁如此之众,势必严重影响官府的收入,官方也就不可能如此听之任之,而必然会采取各种搜括措施。另外,据《会典》记载的规定:“每三年一次,由府奏委司官一人,前往各庄编审丁册”^②。该委司官即使再不负责,特别明显的残疾者诸如“罗锅”、“身矮小”一类也未必能轻易蒙混。

将表 2、表 3 列举的数字与潘氏家族的情况对比后可以推断,假造废丁的情况应该是存在的,但即使撇去这些因素不计,残疾者的比例仍然要高于正常估计,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口素质低下的真实情况。至于道光以后户口册中的废丁明显减少,潘氏家族也不例外,这固然与赋税制度的变革有关,但也不能排除生活条件改善之后人口素质提高的因素,因为就潘氏来说,其家的兴

① 因所掌握的肥地一面城册自乾隆二十一年(1756)始,自时国、世二辈人绝大多数已故,未记其身体情况。

②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十“内务府”,第 18 页。

表4 潘氏国事支病残和逃亡情况

序号	四世(国)	五世(世)	六世(智)	七世(单字)	八世(文)
1	国泰*	世有*	李五*(腰坏)	潘禄*(腿瘸)	文义*
2		世美*(陈癆)	大小子(无嗣)		
3		世功*	荣智*(残疾)	潘珍*(百总、族长)	文惠*
4					文焕*
5			江保*(注逃有案)	潘玉*(逃丁)	
6			贵智*(废丁)	潘凤*	文昭*(百总、废丁)
7					文广*
8					文庆*
9				潘儒*(眼睛)	文生*
10					文印*
11					文廷*
12					文亮*(纳五品衔)
13				潘林(通肠,报逃)	
14			四儿(报逃)		
15			老各(无嗣)		

* 表示已婚。

先有三子,一个眼坏,两个早夭。郑俊之孙郑禄也是眼疾。郑凤之子郑羲法为废丁,未写具体病症;另一子郑羲太为腿坏,郑羲云为废丁。

羲字辈的下一代基本上已到道光时期,前面说过,此后册子对废丁的记载明显减少。而仅从起字到羲字的三代看,其中竟有半数左右的人都患眼疾,这就不会是外伤,而是传染病或家族的遗传病了。

与此可以进行对比的是郑起哲一支只有福字辈有两名废丁,这两人得的也未必是眼疾。从户口册看,起哲一支与另几名兄弟不居住于一处,据其后裔讲是后来迁到龙湾的,显然有几分道理,也许正因此这一支人便没有传染上眼病。发人深省的是,起字辈几兄弟都是内务府买卖人,但龙湾的郑起哲后来被“贝也赠六品职衔”,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郑杰为“敕封武信郎”,次子郑俭被“敕封八品职衔”^①,此后又多次有人任骁骑校、笔帖式、催长等职衔,读书为宦者代不乏人,而灰庄屯居住的郑起达虽然也身为买卖人,但后代中仅有个把人做过百总。二者的差别如此之大,与灰庄屯一支病残者多,造成家境差距拉大,又影响到进取功名和在旗内任职者人数减少等因素,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内三佐领下壮丁不像八旗官兵需披甲出征,所以他们致残的主要原因,并非战争,而首先是传染病和遗传病。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郑氏的眼疾,此外如潘氏册中提到的“陈癆”、“吐血”等,很可能就是肺结核。另如在册中与潘氏紧邻的陈氏中,“陈癆”者占有很大比例,加上潘氏所娶女子中,也以姓陈的数量为最多,如果此陈就是彼陈的话,潘氏家族受此病传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册载潘世美即为“陈癆”,不过国泰一支与陈氏通婚的并不多)。其次是与当时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在当时人记载的那种“河水泛滥、草莽霾天”的情况下,无论儿童在户外活动还是成人的垦荒劳作,都随时可能导致眼瞎、腿瘸等残疾。总之,户口册对于病残的记载,正是当时辽北一带自然环境以及生活、劳动条件都颇恶劣,人们的身体素质相对较差的具体体现。

三、病残者的逃旗与婚姻

(一) 病残丁与逃丁的关系

^① 骁骑校为武职正六品,笔帖式由七品至九品不等,催长无品衔。以上均为八旗官职。

盛正是从文字辈开始的。

(三) 郑氏家族的病残者与废丁

为避免所举潘氏家族的情况成为孤证,再以盖州册中的郑氏家族情况作为对比。按该册记,在灰庄屯居住的起字辈兄弟,其下一代共有七子,其中三人患有眼疾,即郑维,眼瞎;郑先,眼坏;郑侃,陈瞎。再下一代的羲字辈中,如郑纯之子郑羲洪为废丁,其子福喜又有眼疾;羲洪有5个弟弟,2个为废丁,2个早夭。郑仁之子郑羲辉亦系眼疾。须知郑纯与郑仁二人并未被注明有病。另外,郑

所谓逃丁,即自行脱离旗籍的人丁,也是户口册中常见的一种丁,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并不情愿接受八旗的控制并在竭力挣脱它。户口册对逃丁的记载,常有“某年某月具呈报逃”、“陈逃”和“报逃有案”等几种情况。陈逃是指逃走多年者,常有100多岁的,如在道光朝逃走时正值30多岁的壮年,到宣统朝按推算100余岁,应该早已故去,但在旗册中仍被每三年一次注明。至于“报逃有案”,显系因犯罪而逃,据册载有行窃、聚众赌博及“因奸儿媳未成”等^①,不一而足,而以行窃者居多。

逃丁的出现有几种可能性:一是畏罪潜逃;二是为逃避赋税和差役;三是因生计所迫远走他乡(如边外)。当然也不排斥为谋求更好出路而出走的。一般来说,当以后两种人数所占比例较大,但尚需足够的材料做佐证。

从潘氏家族病残者情况看,有两个问题引起我们很大兴趣,其一就是残疾者与逃丁的关系,这里不妨再从户口册中所载潘氏中择取几例:

长子国治—世虎—三小子(漏疮)—常禄—潘喜(废丁)
小六儿(逃丁)
次子国安—世英—塾瓶(身短小)—小五子—小福子(逃丁)
世奎—佩智—刘保儿(罗锅)—文发(废丁)—潘存(逃丁)
淘气—文库(废丁)—小四儿(具呈报逃)
三子国明—世凤—进智—潘训(废丁)—文秀—万云(因行窃销除旗档)
小十儿(记逃有案)
小得子(逃丁)

五子国泰—世有一—李五(腰坏)—潘禄(腿瘸)—文义(逃丁)

这里所举几例,让我们联想到废丁与逃丁之间或许有些关系。不惟潘家如此,在我们考察的乾隆十四年、四十八年和嘉庆三年的三份肥地一面城人丁册中,逃丁与病残丁乃至废丁的人数都呈正比。居于辽南的郑家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郑起学之子郑维为瞎眼,其子羲洪系“陈逃有案”;另一子郑纯生六子,其中有两子均于嘉庆三年(1798)逃走,很可能是一同逃走的,其中的羲文即为废丁。

从这些例子可以推测,他们或是因为病残导致丧失劳动力,逃走是为了躲避赋税和差役,或是因病残导致生活无着,不得已而靠偷窃等行为为生,如郑维之子郑羲洪、潘国明一系的潘万云等所谓的“陈逃有案”,恐怕都是如此。

这里还可进一步讨论:如果说旗丁逃走确实与躲避赋役有关,这便是病残者不能减免赋役的一个有力证据,因为如果病残者可以免赋,他们就没有逃离家乡的必要;再者,如果病残者可以很轻易地假冒或隐瞒,他们也没有必要报逃。可见册中所记残疾比例确有相当的真实性和真实性,而当时的赋役,对于内三旗的一部分旗人,至少是其中的病残者来说,还是较为沉重的。总之,将逃丁与废丁结合起来研究,或可为考察八旗制度中人与赋税的关系,提供某种新的思路。

(二) 病残丁的婚姻

从表4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病残者照样娶妻生子,有些还子孙满堂,说明因伤致残者的人数可能要大于因病者,因为如果是在劳动中受伤导致眼瞎、腿瘸、腰坏一类,既然不会遗传,也就不会影响到生育和后代的繁衍,这也许便是潘氏家族到近世终于繁衍成巨族的原因。另外,病残者几乎都能娶妻,是这些人的生活水准并不很低的一个证明。二者结合起来考察可知,这些旗人的生活并不是十分贫困,大多数人能够娶得起妻子,但生活与劳动条件却非常艰苦,事实上,这也正是新垦辟的移民地区的普遍情况。

^① 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大甸子户口册郑万玉条下。按奸儿媳之例较为特殊,故记出处,其余如行窃等案因在各类册子中俯拾即是,故不另。

四、族谱与户口册的对照

从户口册中所见潘氏家族的一片凄惨景象,在我们从开原市靠山屯镇收集来的《潘氏族谱》中却无迹可寻。因为凡族谱均为该家族的后代子孙所修,本着敬宗收族、隐恶扬善的原则,对其祖先的过去,即使要刺恶也多用隐笔,这是所有族谱的通例。《潘氏族谱》在追溯国泰一支的兴衰时有如下一段记载:“二弟潘儒与长兄分居后,行止益无检束,嗜于赌博,因而资产荡然一空,家徒立壁。”潘儒首次出现于户口册时是个孤儿,名叫二保,年 11 岁且眼瞎,这很可能是因父死母再嫁之后无人呵护所致,所谓“行止益无检束,嗜于赌博”,则不知从何谈起,因眼瞎丧失劳动力而只得终日赌博也未可知。值得深思的是,为家族修谱的后人宁肯记载祖上有过的种种后天恶习,却对家族曾有过的疾病、残疾不着一字,这也许是祖上口口相传自己家族史时就从未提及于此,祖坟的碑文更不会语涉此事,也许是修谱人的有意掩饰。考虑到笔者过目的大量族谱对这类生理疾患都缄口不言的事实(至少我们没见过任何一部记载祖先有任何疾病的族谱),可以看出人们的普遍心理,就是或对家族中疾病的视而不见,抱忽视态度,或对于家族中生理的疾患与残疾,甚至比后天的恶习更引以为耻。是否存有这样的心理,尚未见引起学界的注意,也未见对此有过讨论。我们在查阅各种家谱、族谱时,总是将谱中记载的人物作为健康人看待的,这是我们研究时不经意间为自己确立的前提,即使我们会怀疑谱书的真实,也只是从社会的角度(如族源是否准确,是否有人因违犯族规而未记入谱中等等不另)来进行考订。将潘氏族谱与户口册进行的对比,却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些人口在生理上的情况,以及修谱者何以如此隐讳的心理,这二者都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研究空间。

对辽东移民人口行为的研究,是一个尚待开辟的领域,读者不难发现,本文中提出的疑问要比解答的为多,而还未发现的问题,也许又远远多出这里所能提出的,这说明此项研究还大有拓展的余地。当移民史的研究不仅仅囿于移民迁移的时间、地区、数量(当然这也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基础性的),而且也伸展到他们的婚姻、生育、健康、死亡等实际生活的时候,他们生活的困苦、生活质量的低下,与自然搏斗的艰辛,才会进入到我们研究的视野,而没有这样的具体把握,是很难将移民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境界的。

(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

***** 欢迎订阅 2002 年《市场与人口分析》杂志

《市场与人口分析》(双月刊,逢单月月末出版,16 开,正文 80 页)是一本由北京大学主办,以人口、老龄、劳动、统计、计划生育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学术期刊,自 2000 年改版与扩版以来,以其一流的学术水准,密切联系实际定位风格和严格、规范的编辑体例受到各界的推崇与好评。

《市场与人口分析》所刊文章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劳动、统计、计划生育等领域的研究与应用,每期并辟有“人口与健康”、“人口普查与分析”、“老龄研究”、“计划生育”、“工作研究”等专栏,刊登中外重要学术动态与信息。

2002 年《市场与人口分析》的办刊方针和编辑体例同 2001 年,每期定价仍为 7.80 元,16 开 80 页,全年 6 期,共计 46.80 元。本刊面向全国发行,读者可向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82—737),也可直接汇款到刊物编辑部(地址: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71,电话:62751975)邮订,联系人:景来明。